

第一章 潮汕佛教的初传和发展

一、潮汕佛教的初传及其原因

潮汕之有佛教,最早源于何时,暂时虽然不能下一个确凿的结论,但说可以追溯到唐初,估计问题是不大的。众所周知,潮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而据慧原法师《潮州开元寺志》谓,寺内耆宿相传,开元寺初名荔峰寺,因寺内原有一座叫荔峰的小山丘,寺遂以为名。到开元年间始改今名。那么开元寺在盛唐之前就有了。但开元寺可能还不是最早的潮州寺院,据中山大学马明达先生所发现的资料——元代名僧大? (1284—1344)《潮州南山寺记》一文说,南山寺(亦名广法寺)“建于唐初”;并且说,开始时未有寺产,到开元二十二年(734)有揭阳冯氏女捐赠了田产。这么看来,南山寺创建的年代可能比开元寺更早,也就是说,唐初潮州就有佛寺了。

佛寺是应民众信仰佛教的需求而建立的,有佛寺就说明有信佛之民。唐初潮州的崇佛之风,有可能得力于一些佞佛的士大夫的提倡。汕头大学黄挺先生在其《唐临与佛教思想在潮汕的传播》一文里,论证了初唐显庆年间(公元 660 年左右)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唐临的佛教思想,及其对潮州佛教传播的影

响,认为,唐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所著的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冥报记》一书,在当时曾广为流行过,在他刺潮的四年间,也曾潮州流传,潮州也因之有了信佛之民,这一点似无疑义。

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唐临笃信佛教,从仕论刑以宽宥为原则,他的《冥报记》宣扬因果报应之说,主张扬善止恶,这种思想宣传,对一个远离封建统治中心,仍处于‘蛮风瘴雨’的潮州来说,用以作为有效的政教的辅助工具是最恰当不过的。因此在他长达四年的治潮时间里,在民众中积极推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应在情理之中。而这与唐初即建有佛寺这一点恰好是相呼应的。

潮汕地处江南海隅,直至唐代,还是南方最荒僻的州郡之一。沿海滩涂遍布,有鳄鱼蜿蜒其中,山岭逶迤,亚热带森林茂密,毒蛇猛虎出没,“毒雾瘴气,日夕发作”(韩愈语),是一个被中原人视为蛮獠之藪的地方,虽说此时汉族移民不断增多,一部分蛮族也趋向汉化,但总的来说,汉人仍为少数,蛮、僚、俚、疍等少数民族仍占大多数。因为文化未开,淫祀和迷信盛行,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统治着民众的信仰和精神世界。例如起源于越族的“祀蛇之风”就十分盛行,直至宋代乃至宋以后此风犹存,这正是越族人图腾崇拜的遗留或演化。这种原始宗教观念,在来自中原的士大夫如唐临等眼里,无疑是一种落后愚昧的风习,有必要加以诱导和扶正。从思想改造上,做法不外有两种,一是从儒家思

想立场出发进行教化，二是以佛教思想加以引导。很明显，在当时，佛教思想所起的作用更大些。因为佛教终究是一种宗教，与民间信仰容易相互接近，进而落地生根。而就最初传入的佛教思想来说，无非是诸如《冥报记》中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观念，可以立即与民间信仰中的“精灵感应”以及消灾免祸、致福益寿的宗教需求联系起来，从而使佛教思想得以迅速传播。

有了这样的信佛基础，在这之上建立传播佛教精英思想的基地，也就显得比较顺当了。一百年后，惠照禅师于大历初年(766)自粤北传曹溪法乳而归，传禅于潮阳西山，创建了粤东禅宗道场，学者远近云集，中国禅宗史上有名的大颠禅师、江西信丰人药山惟俨禅师均出其门下。惠照在潮汕点燃的禅灯又由灵山大颠传承下去，贞元七年(791)大颠开法于潮阳灵山禅院；“学于师者，其徒实繁”；漳州三平寺开山义忠禅师就当过他的侍者。五代时编撰的禅籍《祖堂集》记载了他与韩愈交往的逸事，说开始时韩愈命使者礼请大颠至州治晤谈，大颠“三请皆不赴”。侍郎“三请”，说明大颠在潮汕德望之高。而大颠“不赴”，则说明其风规高峻。毫不疑问，在当时，以惠照、大颠为代表的佛教禅宗曾对潮汕民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影响。以致今人饶宗颐先生《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一文，在论及潮州人学术时总结道：“唐世先得禅学之薪传，继起乃为儒学。潮州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

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二、潮汕佛教的发展过程

宋代佛教

两宋是潮州社会历史发展的繁荣时期。本地区因人口的剧增,土地大规模开发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海内外商品贸易日趋发达,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省内人口稠密、农工商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此相应的是,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十分兴旺发达,佞佛贍僧之风极一时之盛。据可考的禅宗史料载,宋代的潮汕地区就为中国佛教史贡献了三大禅宗高僧:华严道隆、报本慧元和祐圣法^唐,而失载于史册中的就更多了。

宋代潮汕本地的佛教,十分有特点,这就是世俗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从山林走向都市

在唐代,潮州佛教的性质是禅宗的佛教,山林的佛教,高蹈出世的佛教。当时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所开辟的潮阳西岩、白牛岩、灵山禅院等,其影响大于潮州府治中的一些寺院,潮阳一带山野中禅宗薪火,远较府治中的香火为盛。而大颠一脉门风之高峻,轻易不与世俗相勾通,足显其山林佛教之特色。入宋以来,随着城市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逐步密切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佛教呈

现了都市化的特色。例如从寺院建设上说，新寺院主要创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集市、村落以及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上。诸如潮州三县的主要寺院：开元寺、大隐庵、广法寺、静乐寺、净慧寺、寿安寺、宁波寺、隆庆寺、千佛塔堂、石塔寺、罗汉院、双峰寺、宁福院等建在府治或县治中 至如灵和寺、少林寺、观音净土堂、龙潭寺、董山寺、平峰寺之类，则建立在较大的市镇上 南宋创建的 14 座驿庵全部建在闽广交通干道上。

福德报应观念的普及与强化

宋代佛教的修行观念，主要不再落实在参禅证悟上，而是强调福德报应、宣扬乐善好施。认为向寺院、僧人包括向社会、他人作财物布施，捐输善款、土地或物品等，就可以增长功德，生时得到安乐，死后得到超升。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产生了一种专门倡导、劝进他人行善布施的带头人——“劝首”。而就佛法修证上说，则本地再未见有如大颠一流的特出的高僧。

寺院物质经济的惊人增长

由于福德观念的普及和强化，导致了寺院经济的惊人增长。例如信徒的施田，大宗的有南宋开禧元年（1205），落籍潮州的福州人林绍坚一次就施田六千八百四十八亩给开元寺；潮阳宝光寺有邑人吴颜施田四百六十亩；治平寺有邑人刘世荣施田地九百余亩 龙潭寺（后属澄海）有邑人陈双桂、蔡丰湖施田若干亩；揭阳双峰寺宋时有田地二十四顷七十七

亩,除部分朝廷赐田外,大部分田地都来自捐施。至于向寺院捐款、捐物等,不论贫富,个个都努力而为。大到捐修寺院,小到捐佛像供养,在当时社会上构成了一道乐善好施的动人景观。

浓厚的福德报应观念,僧人积极入世的参与以及官府的认识和利用,使宋代潮州佛教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1、协助官府兴办慈善事业

宋代从京都到地方,都有由官方举办的规模很大的公共救济机关,从收养弃儿,收容难民,医治病患,寄棺安葬等等,一应俱全,多命僧人主持其事。潮州也不例外。这在《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州府·公署·养济院”有明确的记载。

2、驿庵、路桥之修建与经济带动

所谓驿庵,即以驿为庵,以庵养驿,庵驿合一的一种官办庵舍。其主要功能是为过往商旅提供食宿,确保官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据《三阳志》所载,从绍熙二年(1191)至宝佑二年(1254)六十几年间,潮州自现在的饶平至潮安、揭阳、潮阳、惠来、普宁、揭西直至与陆丰交界的公路沿线,陆续建成 14 座驿庵。所谓“若要富,先修路”,在确保了闽广公路交通畅通的同时,也就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至于修桥补路,更为僧俗善信所乐为。例如大峰祖师于南宋初年创建了潮阳和平桥,就大大方便了过往行商,为潮汕乃至闽、粤两省的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3 资助文教事业

从北宋开始,在生产发展、工商兴旺、人口繁衍的形势下,许多治潮长吏,高举韩愈的旗帜,大抓文教事业,使潮州这个地处岭外的偏远小郡获得了‘海滨邹鲁’的美称。这其中,佛教界也曾为文教事业添砖加瓦,也有一份功劳。诸如佛寺出资助学、固定提供教育经费等,都多见诸方志记载。甚至在南宋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因为潮州府考试的贡院因兵燹焚毁后,每逢科举考试时,只好商借大型寺院作考场。这说明佛教界还为科举考试提供场所。诸如此类,说明佛教为当地的经济、文化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元代佛教

元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十三年(1276)宋亡。十四年元兵追击南宋残存势力至闽粤,进入潮州境内,自此至二十一年(1285)八年间,潮州烽火连天,战乱频仍,陷入一场数百载以来未遇的兵祸之中。先是潮州知州、安抚使马发守土抗元,由于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投降元兵,黄虎子的叛卖,潮州城被攻破,马发自杀殉国,元将唆都下令屠城,然后北返福州,命陈氏五人“权知州事”。其次是漳州的陈吊眼率义军进攻潮州,但被陈氏集团击退,而潮州生灵又遭涂炭。至元十五年(1278)南宋宰相文天祥率军转战粤东,与元将张弘范激战潮州境内,文天祥终因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以俘获文

天祥有功的陈懿被张弘范举荐为招讨使兼潮州路总管。自本年算起,元朝统治潮州共九十年(1278—1368)这以后几年粤东地方仍甚不安定,山寨林立,互相攻掠,百姓颇受其苦。只有到了至元二十一年枢密副使月的迷失以广东宣慰使职位进驻潮州,讨平各山寨势力,潮州才由乱转治,逐步安定下来。

宋末元初的兵燹,给潮州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人口大减,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佛教界也同样损失惨重,寺院大量被毁,僧尼逃亡。例如建于南宋初年的揭阳名利双峰寺被烧成白地。

元朝统治者从忽必烈开始,十分崇信佛教,尤其大力扶植西藏喇嘛教,任命西藏僧人为帝师,给予各种特权,同时,也对汉地佛教采取崇尚姿态,而给予相当的待遇,终元之世,元朝统治者大建佛寺,赐田赐钞,蠲免寺院赋税,由是佛教在短期内就很快恢复了生机,有了较大的发展。

例如,今澄海境内莲花古寺即建于至元二十六年。在寺东面的山坡上,有石刻‘至元己丑’‘开山立石’等字样,这可能是莲花古寺建成时的‘开光’纪念石刻,这是已知元代潮汕境内较早的佛教遗迹。

有些数字也能说明部分问题。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观’中,潮阳县从唐代到清代共有 36 座寺院,其中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寺院就有 8 座,须知元代国祚甚短,只有近百年时间,可见元代所建寺院是不少的。海阳县也有 7 座,虽从历代所建寺院所占比例上不算多,但在原有寺院的大量重建上,以及

寺院经济的发达上，比前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宝积寺与法光寺，更是颇有名气的大寺。法光寺，元代大德年间建，有寺田一千二百亩，规模较大。以致元、明有一段时间开元寺衰落不振时，寺内的专为皇帝祝圣的道场‘万寿宫’都移设法光寺。宝积寺则是元代高僧胆巴所建的藏传寺院，地位十分特殊显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不少寺院的修建，与官吏直接参与支持有关。如海阳县的华严阁、圆通阁、帝师殿以及揭阳县的双峰寺等的修建，就属于这类情形。这说明在元代，潮州佛教更受地方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成为元代官府利用以作为有效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元代佛教中，潮州本地未见有特出的高僧，倒是在至元二十六、七年（1289—1290）间，有元一代高僧胆巴的遭贬来潮，才是潮州佛教史上的值得一书的一件大事。

胆巴，是继八思巴之后又一位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崇重的藏传佛教高僧。他曾为皇帝、皇太后、诸王、将相、贵人等授戒，执弟子礼者不可胜计，深受朝廷上下高度崇拜。后因得罪权相桑哥，于至元二十六年被贬谪潮州，驻锡在开元寺里。

胆巴在潮时间只有两年左右，他在潮州期间，先是为枢密副使月的迷失之妻治病，后来创建宝积寺。

月的迷失的妻子得一种怪病，久治无效。胆巴用密宗法术治好了他妻子的病，取得了他的信任和崇重，在月的迷失的支持下，胆巴兴建了宝积寺，并

亲手塑制佛像。胆巴被召回大都后,向元世祖禀报此事,世祖赐寺名‘宝积’并赐田二十顷(2000 亩)。

大德七年(1303)夏,胆巴圆寂。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追号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胆巴的潮州之行,是潮汕佛教文化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么一个闻名全国的金刚上师的到来,有驻潮大吏的推崇和带动,并且创建了一所藏式佛寺,势必在潮人社会掀起一股藏传密宗崇拜的热潮,并对潮州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存的一些史料和实物之中,仍能见到元代潮州密教一度兴盛的遗迹。

明清佛教

明清时期的潮汕,人口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十分繁荣,经济空前发达,佛教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首先表现在寺院的大量修建上,现存的潮汕各地的寺院,绝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创建的。例如慧原法师《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中,在其《潮州市佛教寺庵创建朝代一览表》上列举了潮州市(不包括饶平县在内)各朝创建的寺院,分别为唐 2 座,宋 15 座,元 6 座,明 20 座,清 31 座。这里的数字的准确性虽还有待商榷,但却清楚说明了上述问题。作为潮州府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府治是这样,其它地方也是如此,诸如饶平、澄海、普宁、惠来、揭西等县市,除了为数不多的寺院外,绝大

部分创建于明清时期。

不过，明清时期佛教的世俗化更有甚于前朝。所以，上述情况与其说明佛教信仰的空前发达，不如说是三教合一、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的兴盛。在一所寺院中，常常是佛菩萨与太上老君、玄天上帝、文昌帝君等并存供奉，神佛融洽无间。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不外是求财求子，消灾植福，佛祖等视于神祇，寺院无异于神庙。

正因为佛教的日益世俗化，因此看似欣欣向荣的佛教，从里至外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从佛教内部来说，是因为僧人素质低下，戒纲松弛，私度泛滥；而发达的寺院经济又促使僧人进一步贪污腐化，生活糜烂，而导致了信众的不信任。从外部来说，是官府、豪右侵吞寺产，使得寺院经济濒临破产境地。这种僧俗之间的财产尤其是田产的纠纷，在潮汕各地寺院都常有发生。现存大部分明清的寺院碑记，都是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尤其以潮州开元寺为典型（拙作《清代潮州开元寺的田产纠纷》就是专门反映这一事实，参见《潮学研究》总第 7 期）。进入民国以后，潮州佛教已经相当衰落了。

明清时期，潮汕出现过几位较有名气的僧人。一是大埔籍的木陈道忞，道忞历主江浙各大名刹，在当时的禅宗门内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又作为明朝遗民而受清顺治帝的征召，并被赐号“弘觉禅师”而备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的争议。不管如何，他都是明末清初时期有全国性影响的潮汕籍高僧。明末

清初还有一位高僧是惠来籍的超月，康熙年间潮汕地区大旱无雨，饿殍遍地，超月本着慈悲济世的大乘佛教精神，四处奔走募化粮食，救活饥民无数，被称为“活佛”。清代乾隆年间，潮州开元寺静会禅师，也是一位备受崇仰的高僧，他先是协助其师、曹洞宗高僧密因古如禅师整顿粤东首刹开元寺，使弊端丛生的子孙丛林开元寺成为戒纲森严、道风丕振的十方丛林；其后又以八十高龄，与法侄道昆两人风餐露宿，万里迢迢，晋京奏请“龙藏”，为弘扬佛法作出巨大贡献。清末，南澳出了一个仁智禅师，仁智戒行精严，证悟高深，由他开创的潮汕临济宗黄檗派，代有传人，为近代潮汕本地、香港以至东南亚佛教贡献了一大批德学兼优的高僧。饮水思源，仁智禅师不能不说也是近代衰落的潮汕佛门中一位难得的龙象。

现当代佛教

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政治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社会各种矛盾加剧，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后，接连爆发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极大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但佛教界因积重难返，对社会历史变革的反应迟钝，在倍受冲击的同时不知所措，苟延残喘。由清末张之洞提出的“庙产兴学”的主张，在民国时期又多次被国民党内政部提出来，使得佛教保守派大受震动，手足无措。虽然经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有识之士的极力争取，才使该主张始终未得以正式实施，但也说明佛教界的昏愤

腐败到了何等地步，以及佛教界改革的必要性。由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改革派应运而生，力图挽救佛教界于昏昏愤愤之中。太虚大师主张改革传统寺院制度尤其是财产制度，大力创办僧伽教育，他的一系列的主张和实验，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却也给当时佛教界打了一针强心剂。现代佛教正是在这种保守与改革，存在与灭亡的两难冲突中，步履艰难地行进着

潮汕佛教界的情况与全国基本一样。僧界由清末沿续下来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已普遍不能后人正信。不过，部分有识僧俗人士也正以各种方式兴利除弊，重兴佛法。1917年，临济宗黄檗派下高僧怡光法师就任粤东首刹开元寺监院，即率先在寺开讲《金刚经》，翌年又倡导僧俗念佛。讲经念佛，本属佛教界的家常事务，在潮汕却荒废日久，经由怡光法师的重新提倡，开元寺乃至全潮州的佛风为之一振。1919年，潮城著名居士王弘愿，翻译出日本密宗丰山派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得太虚大师的推介，在国内广为流播，从而掀起现代中国佛教界崇密狂潮。1921年，开元寺纯密法师在王弘愿的鼓励下，东渡日本学习密法，成为我国现代东渡学法的第一人。

1924年7月，应王弘愿的邀请，日本权田雷斧大僧正一行¹²人，来潮州传法。作为白衣居士的王弘愿独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传法灌顶，之后又创“震旦密教重兴会”，升座称阿闍黎，到处为人灌顶，开白衣升座说法、受僧人膜拜之先河，在二三十年代的中

国佛教界引起了极大的非议。而王冒天下之不韪，仍我行我素，由是潮州、汕头等地的东密着实热闹了一番。

1932 年 12 月，太虚大师应潮汕僧俗之请，莅临潮汕弘法一周，盛况空前。大师又应开元寺住持福来法师之请，在寺内创办岭东佛学院，命门人大醒主持教务（后为寄尘接任），为佛教界培育了一批僧人；并出版《人海灯》佛学半月刊。

1936 年，江苏籍高僧释智诚在潮州庵埠灵和寺闭‘般若关’，并刺血写《华严经》，为期三年，圆满了八十余万字的刺血写经功德。其为法忘身，艰苦卓绝的精神，为近代以来潮汕地区僧人所罕见。

1943 年日寇侵占汕头期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至多有饿死者，饶平籍莲舟法师（外字定会）大发慈悲，不顾个人安危，越过日军海上封锁线，多次前往东南亚各国募化粮食，回汕发放赈济饥民，活人无数。潮人感恩戴德，特于 1945 年建碑纪念之。

1946 年，在潮汕佛教界的殷切礼请下，一代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来潮汕弘法。著名潮人学者饶宗颐教授特撰文登报，极表欢迎。虚老于 10 月 2 日在汕头弘法圆满，又在潮州开元寺后建水陆法会七昼夜，前来皈依、登记参加法会者不计其数。

1949 年潮汕地区解放。解放后的潮汕佛教，由于一直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佛教总的来说趋向微，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恢复。有一个统计资料颇能说明这种情形。潮州市（不包括饶

平县在内)从解放前夕到 1986 年僧尼人数的统计数字分别为：解放前夕僧尼人数为 366 人，建国后为 241 人，文革前 151 人，文革间 75 人，1984 年 74 人，1986 年 91 人(《潮州市佛教寺庵人数统计表》，见慧原法师《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

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因为不少僧人还俗，参加到新中国建设中来。1958 年又开展寺庙合并运动，僧人、寺产被集中，多数寺庙被挪作他用，也导致部分僧人还俗。“文革”开始，僧人被遣散还乡，不少寺院主要负责人被游斗，寺产被抄，佛像被捣毁，宗教活动完全停止。只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各寺庵才逐步得以重新修复、开放，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并有更大的发展。现在，潮汕各地重点寺院修建项目基本完成，僧人也为数不少，但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佛学修养的僧人却还不多，佛教界人才建设的问题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问题

第二章 潮山历代高僧

一、惠照(约盛唐至中唐时人)

座落在潮阳市区以西约两公里的塔山西南麓的西岩,这里奇石林立,古树葱茏,石室天成。拾级而上,远远望去,有座寺庙小巧精致,依山构筑,而处于闹市之郊,颇有闹中取静的意味。这个在当今寺宇遍布的潮汕地区来说并不起眼的小寺院,相传就是潮汕僧人志于史乘的第一人——惠照禅师的驻锡之地。明隆庆《潮阳县志·輿地志》谓:“县西十里曰西山,其俗曰塔山,旧传有砖塔遗址,砖石尚存,后移入县中,今府馆中者是。其麓有岩焉,曰海潮岩,一名西岩,三面石壁,深广一丈余,相传惠照曾居此,大颠与药山并师之。……”所以,不要小看这所小巧迫窄的岩寺,它竟然是中国禅宗史上两员赫赫有名的宗匠的出家之地,而惠照竟然是他们出家的依止师父!那么,惠照为何许人,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已逝的历史。

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完全建立起来并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仅极大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而且随着某些教义的逐渐通俗化,而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也日

益成为人民大众的日常观念。例如禅宗,自达摩东来,经慧可、僧璨、道信到弘忍的次第传承,到初唐时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宗派。弘忍的弟子慧能,则创立了南宗顿教,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心平行直,内心不乱,外不着相,以平常、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一切,来领悟禅意。这就区别于以前那种‘每禅必坐’的禅修思想,而开始了平民化、世俗化,使得一般民众都能了解和实践禅宗教义。由是,南宗建立后,则不仅为知识分子,并且也为下层劳动人民所迅速接受,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传扬开来。可以说,正是禅宗的兴盛,才使得唐代佛教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也正由慧能禅宗南宗的建立,才使得佛教得以中国化,而为中国民众所广泛接受。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可得知,潮汕历代高僧大都是禅僧,而以弘传南宗禅法知名。事实上,潮汕佛教与禅宗南宗结下的这一不解之缘,在南宗创立的早期就开始了。本篇所要介绍的西山惠照禅师,就可能是六祖慧能的徒孙辈。

六祖慧能大师(638-713),广东新州(今肇庆新兴县)人,父亲早亡,少年时即砍柴卖钱侍奉母亲。一日听人诵《金刚经》而颇有领会,从此立志游方,参禅访道。后北上湖北黄梅山,参五祖弘忍大师,为五祖所器重。在寺中服苦行八个多月后,于五祖言下大悟,为五祖所印可,并付衣钵以为表信,成为五祖嫡传弟子。因慧能当时只是一个晚入道的行者,而不是久参比丘,寺中一些六根不净的和尚难免对他